

孟长有烈士传略

刘 钧

孟长有，宁夏早期著名革命烈士。1938年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被党组织派回宁夏，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41年4月1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为宁夏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学 生 时 代

孟长有，字子恒，乳名对对。1916年农历二月五日出生于中卫县柔远堡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孟学义，上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其母王氏，生五男二女，女居长，孟长有排行为二。5岁时，父

亲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三字经》、《百家姓》等是他童年的启蒙读物。12岁入柔远堡玉皇阁私塾读书。他很用功,颇得师友称赞,但常遭到富豪子弟的讥讽和歧视,因而在幼年的心灵就孕育着反抗强暴,痛恨黑暗社会的种子。

1933年,16岁的孟长有考入中卫初级中学(简称中卫中学)就读。在县城读书,生活费用全靠家庭供给。但家境并不宽裕。他省吃俭用,尽量替父母减轻负担。在中学期间,他刻苦自励,勤奋好学,品学兼优。他爱好文史,长于写作,常常利用作文针砭时弊,抒发爱国之情。他除了学好各门功课外,还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唱歌、打球在学校都小有名气。

孟长有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在学校他看到学友生活困难时,便主动接济。家里给他点零花钱,他舍不得花,但发现家境贫寒的同学买学用品无钱时,便解囊相助。见到不平之事,他敢于仗义执言,抱打不平。一次,他上街看到一个阔少无端殴打外地来的讨饭人,便挺身而出,制止了那个阔少的蛮横行为。他的家乡有一个姓崔的

保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有一次到孟长有家抓兵，大耍淫威，孟长有借机用木棒狠狠地把这个恶棍揍了一顿，为民出了气。孟长有生在农村，自小热爱劳动，学校放假期间，他主动下地帮助父母干活。他手脚勤快，干起活来十分麻利，深得父母喜爱和乡邻的好评。

孟长有在中学阶段，已跨入青年时代，也是他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西安事变”后，中卫中学集聚了一批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这里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秘密阵地之一。中共地下党员尚钺（又名尚健庵）、潘钟林以及进步教师雷启霖等人先后在中卫中学任教。他们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启发、指引青年学生奋发向上，投身革命。孟长有此时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思想进步很快，很受老师器重。在尚钺和潘钟林老师的引导下，他积极参加学校里开展的进步活动。同时，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鲁迅、高尔基等的著作和一些进步书刊，从而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增长了知识。

1937年秋，孟长有初中毕业后转入宁夏中学

高中班继续深造。是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宁夏中学和宁夏实验小学成为全省宣传抗日、开展革命活动的策源地。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常到这里秘密活动。地下党员张芳山（化名孙方山）、潘钟林也在这里任教。在地下党员的教育、指导下，很多有志青年，关心国家大事，逐步倾向革命。孟长有得到张、潘两位教师的帮助，参加了校内的“读书会”和校外的“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及宁夏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在宁中学习期间，孟长有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野草》等进步书籍，明确了人生的道路，坚定了革命的意志。

奔 赴 延 安

1938年夏，日军大举进攻华北，驱兵华南，半壁山河沦陷敌手。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统一战线，政治局势日趋险恶。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了保存宁夏革命的有生力量，培养武装游击骨干，中共宁夏工委决定选派

一批进步青年和已被敌特注意监视的地下党员到延安培训。是年7月的一天晚上，潘钟林老师带领孟长有、姚怀廉到实验小学会见了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李仰南对他们说：“组织上已决定派你们去延安培训学习，即日动身，先到中宁恩和堡张致和家，取得联系，带上介绍信就到延安去。”孟长有听后，心情激动，热泪盈眶，千言万语，莫能表达。孟长有翌日起程，离开省城银川，回到家中，取了路费，便约姚怀廉、刘大明、李芳荣3名学友一齐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他们一路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闯边卡，过哨所，到达定边。到定边后受到中共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组织部长刘英勇的热情接待，经组织安排，一站一站把他们送到了延安。

孟长有到延安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编入洛川一大队二支队。通过“抗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以诉苦等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以及基本军事训练，孟长有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掀开了他人人生道路上新的一幕。他从现实的革命

斗争中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唯一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出火海的大救星。他决心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两次写申请书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考验，他于1938年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宿愿。

孟长有入党后，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举办的党务培训班学习。在培训班中，除了系统学习《苏共中央党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教程以及党务基础知识外，还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所作的政治、军事形势报告。从而更坚定了抗战必胜、革命事业必成的信心。

秘 密 回 宁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敌后抗战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因为形势

的变化,组织上决定让孟长有秘密回宁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壮大革命力量,推动宁夏敌后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孟长有服从组织的决定,经宝鸡、固原秘密回到宁夏。

为了找个职业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托妻兄帮忙,很快在中宁地政局石空派出机关当录事。他一边工作,一边还秘密寻找宁夏工委组织,以期取得联系。可是,事隔不久,录事工作被人暗告而解雇。他仍回到中卫,联络同学,宣传抗日。

1940年初,经人介绍,孟长有被同心县海如小学聘为教员。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山村小学里,他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到校后,他把进步师生团结在身边,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利用课堂这个合法的讲台,向学生讲述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策略,讲述红军战士为革命出生入死、英勇作战的故事,讲述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学生走革命的道路。他讲课深入浅出,内容新颖,叙事生动,说理深透,颇受同学们的欢迎。

孟长有为了活跃学校的文艺生活，向学生教唱抗日革命歌曲，并自编一些思想性、宣传性很强的快板、诗歌，组织学生在校内外演唱。如他写的《我的家乡几千年》、《醒俗箴》等通俗易懂，深受群众欢迎，在山区广为流传。

在海如小学，孟长有积极倡导和协助校长李仕林改革旧的教学制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制定并推行了“开门办学、民主办学、读书救国、德智并举和重视文娱体育活动”的“五提倡”办学方针。海如小学一改过去陈规旧律和死气沉沉的局面，各项工作有了生机和活力。

孟长有一边教书，一边还深入群众，做社会调查，搞抗日宣传。他向山区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山区回、汉人民团结起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动员一些回、汉青年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参军参战。他在喊叫水一带山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他的宣传影响下，不少学生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如他教过的学生贺永洁，早年投身革命，解放后当了同心县委书记。就连和孟长有在一起共事的校长李仕

林也成了开明进步的人士。

浩 气 长 存

正当孟长有在同心县海如小学开展革命、宣传抗日、组织革命力量时，宁夏土皇帝马鸿逵又撕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协议，顽固地坚持“反共”、“清共”的反动政策，公然命令军、警、宪、特侦察和搜捕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省，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40年4月13日，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组织部长白玉光、宣传部长王博相继被捕入狱。17日晚，孟长有也被卫（中卫）、宁（中宁）、同（同心）三县军警督察处逮捕，押往银川，监禁在宁夏第一监狱。

入狱后，孟长有受到国民党宁夏军警特务头目马孝贤、程福刚、高仲弟等刽子手的多次严刑审讯。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毫无惧色，正义凛然，严辞申辩，质问敌人，坚贞不屈。敌人用皮鞭抽，老虎杠子压，揭背花，拔脚筋，把孟长有打得皮

开肉绽，血肉模糊，几次昏厥气断。但他视死如归，骂不绝口，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硬骨。

敌人为了瓦解革命营垒，用酷刑胁迫狱中共产党员自首，发表“反共启事”，但遭到了孟长有等人的坚决抵制。特务李郁华强迫孟长有填写悔过表，被孟长有严辞拒绝。马效贤、高仲弟又连夜提审他。“活阎王”马效贤问他：“你为什么不填表？”孟长有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没有错误，悔过什么？”马效贤又问：“你到底转变不转变？”孟长有说：“我认为共产党好，没有转变的必要。”马效贤恼羞成怒，大叫道：“不行，他太顽固了，我一定要解决他。”敌人在这个坚强的共产党员面前，五刑俱败，丝毫未能使孟长有屈服，最后又施出了软法劝降的花招。敌人派孟长有的同乡、国民党宁夏教育厅卫、宁、同三县特派员张济美出面劝降，以高官厚禄为诱饵，都遭到孟长有的严厉痛斥。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引诱威迫孟长有的父亲到狱中劝其“悔过自新”。孟长有识破了敌人的险恶用心和卑鄙伎俩，对父亲说：“我做的事情都是正义的事业，您老人家不必伤心难过。我虽不

能为您尽孝，但能为党尽忠。儿今生革命，矢志不移，您也应以此为荣……望您多多保重身体。”狱中，父子两人挥泪告别。

孟长有在狱中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敌人极端羞怒和恐慌，但博得了狱中战友的高度赞扬。1940年5月14日，崔景岳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信中说：“在所捕的人不管其是否为真党员，都完全自首了。现在在政治上站定足根的抗大生孟长有、白玉光、王和我共四人。现在要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党中央……”。

为了同敌人进行特殊的、持久的斗争，狱中成立了由崔景岳、孟长有等5人组成的党支部。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牢房中的难友团结一致，顽强斗争。孟长有身处囹圄，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很强。他为难友教唱《延安颂》、《义勇军进行曲》、《打回东北去》以及高尔基的《囚歌》等革命歌曲，用歌声向敌人挑战，用歌声鼓舞难友的革命斗志。孟长有在狱中除了同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外，还争取、教育、引导监狱看守俞贵麟（中

卫人)毅然逃离虎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敌人把孟长有视为狱内共产党的“死硬分子”,并将他坚贞不屈的全部情况汇报给了马鸿逵,马鸿逵气急败坏地下令“处决孟长有”。

1941年4月17日深夜,敌人把崔景岳、孟长有和从盐池县捕来的中共回民工作团团长马文良一道,活埋在银川城隍庙后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孟长有等三人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孟长有这个胸怀大志,为党、为国、为民的忠诚志士、优秀共产党员、土生土长在宁夏的革命英雄惨遭杀害。时年仅24岁。

新中国成立后,宁夏人民为了纪念他,把他的遗骨安放于中山公园礼堂之中。1965年12月12日,在银川八里桥革命公墓又隆重举行了孟长有等烈士重新安葬仪式暨追悼大会。宁夏区党委和区人民政府号召全区人民向孟长有烈士学习,为革命多做贡献。中共中卫县委、县人民政府给孟长有烈士敬献了花圈和挽词。冬去春来,每逢清明节,党、政、军各界人士和青少年在他的墓前凭吊祭扫,藉慰忠魂。



何至公烈士的英烈事迹

王允正 关 点

四野南下工作团何至公同志南下到广西，分配在来宾县工作。1950年元月2日到凤凰区赴任，走到泗贯与维都之间的金石坳时，遭土匪阻击。他与王成国掩护同行干部、群众突围脱险，自己壮烈牺牲。何、王牺牲时，都是年仅24岁。此事在来宾被称为“金石坳事件”。

何至公（1926——1950），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城关镇人。参加革命前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何至公父亲何百庆系旧社会大学生、中卫中学教师，后因看不惯国民党政治黑暗，曾经一度辞职务农。何至公在校读书时，就接近新思想、追逐新潮流、宣传民主自由，活动能力强。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上学期间曾组织“建宁

学会”、主编《夏声》。北平解放后，中共兰州市地下党组织推荐何至公等30余人离开兰州到北平，（又一说是从兰州转学到北平师大。解放后，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当时何已结婚，并有一个两岁小女孩何红杏（现已40多岁，在宁夏工学院任会计）。何至公是在武汉被编入广西工作大队的。在南下途中，每到一地找稻草搞地铺、找水烧水、买米做饭、夜晚放哨、何至公都积极地抢着干。从武汉南下，经过长沙、湘潭、桂林，途中何至公同志积极向组织反映队员思想情况，协助组织做思想工作，进一步坚定了南下同志的革命斗志。11月行军到广西全州县境内，在行军中，一同分到来宾县工作的王允正同志右膝关节发炎，无法走路。领导上发动8位同志轮流用担架抬王允正同志继续前进，何至公同志充分发扬阶级友爱精神，自告奋勇抬担架。在敌人布满地雷的行军道上，他不顾自己劳累，不但要抬王允正同志小心翼翼地通过敌人的布雷地段，还要背王允正的枪支行李。当一个营长看到抬担架同志的辛苦，主动把他的一匹马让给王允正骑时，才不再抬担架。

来宾县城1949年11月30日解放。12月20日宣布县人民政府成立。12月17日和21日，南下工作团的同志分两批到达来宾，看到刚刚经受战争创伤的来宾县一片慌乱：敌人逃跑时，抢劫了县内外一切粮食和物资，剩下的只是空荡荡的旧县府断壁残垣。由于敌人反动宣传和暗藏敌人的威胁，老百姓当时不敢接近我们同志，不敢借粮给政府。刚到来宾的时候，甚至每天吃饭的粮食都要经过很多周折向老百姓借征。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何至公一到县城就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12月27日，来宾召开南下干部与本地游击队胜利会师大会。宣布成立中共来宾县委及区、乡政权，任命何至公为三区秘书。

1950年元月2日上午，分配到三区工作的全体同志14人，高高兴兴地整装离开县城赴三区。由于当时铁路不通，县城要去柳州的老百姓和要赴柳投考革大的青年约70——80人，也跟随我们干部队伍行进。

区长谢承亩（原游击队中队指导员）见此情

景，决定派陈仁利、陈可声打前阵，距离队伍约千米左右。其余的7个人带枪又走在大队人马的前面，离群众约200米左右。何至公背着一支“三八”枪，和王成国及本地干部陈士敬、熊家谱、陈宝昌等人随群众队伍行进。

近午，当这支干群队伍走到泗贯与维都之间的“金石坳”（城厢西北20里）时，突然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原在水龙村被我游击队缴械的原国民党柳州警备部队副团长刘国成匪部阻击。

土匪有百余人，几十支枪齐向干群队伍冲击，高喊必须全部缴枪，把我们的队伍阻隔成3段。区长谢承亩当即领着几个人卧倒还击。互相对射十多分钟，发现土匪已分两股向我们干部和群众队伍紧缩包围圈，步步逼近。这时地形对我方很不利，不能再坚持。区长谢承亩下令向东边的山梁突围上山。他们安全地到达了山腰时，发现副区长王成国和秘书何至公没有跟上来。

为什么他们二人没有跟上来呢？据混在群众中的陈士敬同志回忆，当时王成国、何至公在群众队伍中拿着唯一的两支枪，为了掩护干部群众

突围，讲一声我们不能一起冲出去，便跳下冲沟向土匪射击，把敌人火力引过来。

他俩每人子弹不多。打完时，谢承亩等人已安全突围上山，但是没有逃出来的群众还在被困。当匪徒听不见还击的枪声，便把没有逃脱的群众围起搜索财物、枪杀青年。他俩见此情景，在下面喊：大家冲出去啊！这些人是老百姓，不能伤害他们。土匪听见是北佬口音，又见身穿军装，便向王成国、何至公开枪，两位同志壮烈牺牲。事后陈宝昌（游击队员）对陈士敬讲：如果王、何二人不喊话隐藏在冲沟里，也许不会牺牲的。当天除王成国、何至公烈士牺牲外，还有7名青年学生被杀害，本地干部陈士敬、熊家谱负伤。

区长发现副区长和秘书没有跟上来后，认为我们人少、枪少、子弹少，再返回战场已无能为力，即带领突围出击的干部过山梁，经格兰转回县城汇报。第二天清晨，县委派县大队到被伏击的现场观察。由于当晚大雨，现场已被水冲刷，除了王、何两位烈士遗体外，相距几百米处，也留下几具尸体。这一情景展现了王成国、何至公